

论洛学的发展谱系与精神特质

◇ 张 辉

摘要:洛学有狭义和广义二分,狭义的洛学指二程及其弟子之学,广义的洛学指由二程创立、历经元明清活跃于中州的理学,是作为地域性的理学流派而成立。广义的洛学历经宋元明清,统绪不绝,代有传人,发展经历了二程及其弟子的创立期、从北宋灭亡到明代中后期中州王学兴起前的维系延续期、自中州王学兴起到清初的兴盛期和清中叶以后的衰歇期四个阶段。在千余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州洛学形成了尊兼容、重笃行、尚致用的精神特质。

关键词:洛学;地域学派;发展谱系;精神特质

北宋以降,理学兴起,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流派,学人历来有濂洛关闽之区分。对于洛学,起初指二程及其弟子之学,后来其内涵不断扩大,逐渐成为中州这一地域理学思想的总称。近年来全国地域性思想研究蔚然成风,洛学的研究也逐次展开,但相比于关学、湖湘学、浙学、闽学这些地域性思想的研究,洛学文献的整理显得十分滞后,研究更是薄弱。目前洛学研究除了二程、孙奇逢个案研究比较集中,其他有关洛学的研究在整体上还比较零散和薄弱^①,尤其在一些关键性基础问题比如洛学内涵的界定、洛学传承谱系的确立、洛学的演变历程等方面依然缺乏论述。本文不揣谫陋,抛砖引玉,以期学界对洛学的研究走向深入。

一、洛学起源

“洛学”虽为学界习用,但并非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目前学界所使用的“洛学”其内涵并不一致。通常是指北宋时期由程颢、程颐兄弟开创,并经弟子传承发展的学派。二程兄弟在北宋士人追求儒学复兴的学风下,吸收借鉴隋唐以来佛教理论成果,以接续先秦儒学为旨趣,构建了以“天理”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之学给予了形而上的解释。二程兄弟长期授学,门下弟子众多,传承有绪,影响极大。

对于二程兄弟的学问,迟至南宋已被称为洛学。南宋刘荀在《明本释卷上》言二程兄弟“倡道于

^① 目前对洛学史撰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汤斌的《洛学编》上,主要成果有周春健《中国古代洛学史著作提要六种》(《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王记录《〈洛学编〉探析》(《历史文献研究》总第32辑),韦泽《〈洛学编〉的编纂原因及内容特色》(《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0期),许倩《清代洛学史撰述中的“汉宋之争”与“朱陆之辨”》(《烟台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清代洛学史著作述略》(《历史教学问题》2019年第6期)、《清代民国洛学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魏弋贺《〈洛学编〉对洛学史谱系的建构》(《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王门洛学的研究主要有钟治国《北方王门后学尤时熙的良知学思想发微》(《孔子研究》2018年第3期)、《河洛王学的“万物一体之仁”说通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杨朝亮《“洛阳王学”尤时熙学术思想述论》(《孔子学刊》第11辑),翟爱玲《论明代洛阳王学的发展进程及其阶段性特征》(《洛阳理工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论洛阳王学的思想特色与学术理路》(《第十八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首届阳明文化国际论坛论文集:下》),柴伟瑞《孟化鲤思想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扈耕田《明代北方心学家王以悟哲学思想论略》(《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明代河洛心学家张信民哲学思想述要》(《洛阳理工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清初洛学个案人物的研究主要为河南大学生建强教授所指导的硕士论文。

洛中,世谓之洛学”,指明洛学是因二程长期讲学洛阳而得名。南宋人卢钺亦谓“洛学源流,世之学者皆能历历指数”^[1],将二程所传之学称为洛学。至明初修《元史》,将宋代理学发展派系明确概括为“濂洛关闽”,洛学之名已广为接受。《元史·儒学传》言金履祥“及壮,知向濂洛之学”^[2]。宋濂在《跋东坡所书眉山石砚歌后》中写道:“自海内分裂,洛学在南,川学(指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学)在北。”^[3]以上所言之“洛学”皆指二程兄弟及其弟子之学。《宋元学案》中全祖望所作之序录论及洛学则言“洛学之魁,皆推上蔡”^{[4]31},龟山“为南渡洛学大宗”,“和靖尹肃公于洛学最为晚出,而守其师说最醇”^{[4]32},同样以二程及其亲炙弟子的学说为洛学。这也是目前中国哲学界通常所指的洛学,也即狭义的洛学概念。

除此之外,对洛学的使用还存在另一种情况。明末清初大儒孙奇逢(1584—1675,字启泰,号钟元,晚年讲学于河南辉县夏峰村20余年,从者甚众,世称夏峰先生。明朝灭亡后,清廷屡召不仕,人称孙征君。与李颙、黄宗羲齐名,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令其弟子汤斌辑《洛学编》,在《序》中孙奇逢表达了洛学之重要以及期冀洛学复续光大的愿望:“盖洛之有学,所以合天人之归,定先后之统,所关甚巨也。厥后废而复明,绝而复续。”^{[5]624}在孙奇逢看来,洛学自宋室南渡以后在北方一度沉寂,之后又经历了一个“复明”“复继”的阶段。《洛学编》分前编、正编两部分,前编收入汉唐宋初人物6人,正编收录自二程以来到明末中州理学名儒凡36人,其中宋13人(附2人),元2人(附1人),明21人(附7人)。清乾隆年间尹会一巡抚河南时,他深感“中州文献之邦,名儒辈出”^[6],且“自《洛学编》版于癸丑,又六十六年矣”^[7],作《洛学编续编》,补录清代孙奇逢、汤斌、耿介、张沐、张伯行、窦克勤、冉觐祖等7人,体例依前。郭程先又作《补编》,补列宋至清7人,之后咸丰年间王涤心作《洛学拾遗》,收录17人,同治年曹肃孙作《洛学拾遗补编》,收录23人。由以上对洛学这一概念的使用看,显然超出了狭义的洛学范围。

从《洛学编》及《续编》《补编》《拾遗》所收录的范围看,其所谓的洛学主要有两个标准,一是它是关于理学的思想。尽管汤斌在《洛学编》前编中收录了汉

唐经师以及韩愈和宋初的穆修,但还是将二程放在了《洛学编》正编之首,以二程为洛学之开创之意昭然可见。二程之后,其所收录者皆为理学家,举凡以文学、史学等著名者一概不录。由此可见,洛学实为关于理学的学说。二是产生、传播在中州这一地区,也就是说学术主要活动地域为中州。这包括籍贯虽不是中州但主要学术活动在中州影响巨大者,如明初薛瑄虽籍贯山西河津,但“发解中州,平生师友半在河洛,实中州明儒之宗”^{[8]1495}。又孙奇逢虽籍贯河北容城,但晚年隐居河南辉县,弟子众多,实为清初洛学复兴之巨擘,故亦编入洛学之中。与诸《洛学编》收录内容类似的还有清初刘宗泗的《中州道学存真录》和耿介《中州道学编》,这里所谓的中州道学即是洛学。从以上关于洛学资料的汇编可见,这里所说的洛学主要是指由二程开创,自北宋到清代以中州为范围的地域性理学的统称,这也是广义上的洛学概念。这里采取广义上洛学的概念。由二程开创,弟子传承的狭义洛学有独特的学术特色,有较为清晰的传授谱系,其成立不成问题,但问题在于广义上的洛学是作为一个传承有绪有一贯宗旨的学术流派,还是作为一个地域之学而成立?若是前者,显然中州理学并无连续不断的师承关系,甚至思想上也有很大区别,那么洛学之名何以成立?若是后者,把洛学视作中州这一地域的理学思想,那么如何处理狭义洛学中的二程弟子及再传弟子中主要活动和影响不在中州的学者,如杨龟山、王蕪等?

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们做这样处理:尽管广义上的洛学跨越达千年之久,期间有废有兴,无严格之师承和思想之传承,思想也互有不同,但正如冉觐祖在《中州道学编》序中所言:“道学一编所载程子以下诸儒,虽所言异词所行异事,而揆之诚敬仁恕之旨,宁有不同此心同此理者乎?”^{[9]6}尽管二程以下中州诸儒人言人殊,所论有诸多差异,但他们有相近的问题域和话语体系,同关注天道性命,大谈心性理气,与中国思想传统中经学、玄学等思想形态有明显不同,同属于主要由二程开创和奠基的理学阵营。加以地理交往的便利,对二程之学的自觉认同和桑梓情谊,广义的洛学其思想呈现出尊兼容、重笃行、尚致用等一些共同的特质,而非举凡与中州这一地域有关的学

术文化的拼凑,因之,广义上将洛学作为一个地域性的理学流派来看待是可以成立的,即是说洛学首先是理学内部的地域性学派。

对于后一个问题,在狭义的洛学概念下,龟山无疑属于洛学范围。《宋元学案·龟山学案》讲:“龟山独邀耆寿,遂为南渡洛学大宗,晦翁、南轩、东莱皆其所自出。”^{[10]195}至于他们的后学传人,遍布全国各地,且多有开宗立派者,如“永嘉诸子之传洛学”^{[10]405},而成永嘉学派,胡安国“私淑洛学而大成”^{[10]449}奠基湖湘学。二程弟子及其再传弟子虽皆上承二程,但是否归属洛学,我们认为主要活动在中州地区的归于广义洛学之中,如谢良佐、尹焞(和靖)等,而主要活动在中州之外与中州关系不大的弟子如杨时(龟山)等则不再纳入洛学,同时亦将理学的重要开创者、在洛阳定居与二程互相唱和的邵雍及其儿子邵伯温纳入洛学之中,这也是汤斌《洛学编》的处理方式。

二、洛学的传承谱系

二程及其中州亲炙弟子与之后的中州理学家,虽然大多没有直接的师承,但都表现出对二程洛学的强烈认同。二程之学在其生前随弟子南传,北宋灭亡后,在北方发展衰绝,在南宋的发展北方学者亦不闻焉,直到元军俘获老儒赵复,姚枢劝以北归讲学,“至是,复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2]4314},北方学者始闻程朱理学。姚枢因不愿与上司同流合污而辞官隐居辉县苏门(即今辉县苏门山),著述讲学。许衡听闻姚枢在苏门讲学,前往拜访,在姚枢处得《伊川易传》,一时担簦负笈者,络绎于道,洛学得以重新接续。许衡弟子耶律有尚曾描写自己对伊洛之学的服膺:“自得伊洛之学,冰释理顺,美如刍豢,尝谓终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11]582}另一弟子郑冲霄任职许衡出生地新郑县县尹时为之建祠,在祠堂记中言:“苟能发明伊洛之学,以卫中州之气,反躬践履,诚敬交孚,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乃是亦私淑艾而已矣!”^{[11]530}表达了继承、弘扬发展中州洛学的期望。

有明一代,中州洛学延绵不绝。永宣之际,渑池

人曹端倡理学于河洛。《明史》本传谓“初,伊洛诸儒,自明道、伊川后,刘绚、李颙辈身及二程之门,至河南许衡、洛阳姚枢讲道苏门,北方之学者翕然宗之。洎明兴三十余载,而端起崤、澠间,倡明绝学,论者推为明初理学之冠”^{[12]7238},以二程、许衡、姚枢、曹端等并为伊洛名儒之代表。明代学者陈建所著《通纪》称“本朝理学肇自曹静修(曹端)”,可见曹端在明代理学之地位。清初大儒孙奇逢同样高度表彰了曹端延续河洛之学的功绩:“河洛之间斯文丕变,此集(《曹月川先生遗集》)之出其有赖乎。”^{[13]360}指出曹端之学“以太极为立本,而求至乎圣人之道,以参天地,惟此心而谓心,非气血两言者,濂洛遗旨也”^{[5]17}。薛瑄本为山西河津人,因其参加河南乡试,平生师友亦多在河洛,孙奇逢《中州人物考》和汤斌《洛学编》皆将其列入。四库馆臣曾言:“明代醇儒,以端与薛瑄为最,而端又开瑄之先。”^[14]曹端、薛瑄皆为明初全国理学之重要代表,这一时期中州洛学执全国理学之牛耳。

对洛学的自觉认同和桑梓情谊支撑着中州洛学的延续和传播。明宪宗成化年间,时任浙江按察使的襄城人李敏回家守丧,因见“学徒云集,至不能容”,遂创建书院。“自程氏两夫子起倡道学,数百年相承,至鲁斋、河东两公皆出河南,古今岂不相及?学之未正,教之未善,驯致乎治之未盛,厥有由然矣。吾辱生两夫子之乡,得私淑鲁斋与河东公之教。”^①指出洛学由二程开创,许衡、薛瑄相承的数百年传承统绪,表达了不负同生于二程之乡的期望。

明中叶以后,阳明心学兴起于江右越中,“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12]7222},影响波及北方。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所列北方王门主要集中在山东河南,但认为北方王门人数较少,成就较小,影响有限:“北方之为王氏学者独少……非二孟嗣响,即有贤者,亦不过迹象闻见之学,而自得者鲜矣。”^{[15]635}实际上,单揆诸中州王学之发展,这一概括即有失偏颇。明代中州王学形成了河南西部以洛阳为中心,东部以商丘为中心的两大传播基地。其中,洛阳王学以尤时熙、孟化鲤、张信民、王以悟、吕维祺诸人为代表,在孙奇逢《中州人物志》中还记载有西川弟子李

① [明]刘昌:《紫云书院碑记》,见《雍正河南通志(卷43)》,四库全书本。

士元、陈麟、谢江、董尧封、吴道行等人。商丘地区以杨东明、杨述复为代表。其中洛阳王学为尤时熙所开创，孟化鲤发扬光大，影响广泛。

尤时熙，字季美，人称西川先生，《洛学编》载他“见王文成公《传习录》读之，豁然有契，于是厌弃词章，一意圣人之学”^{[8]1550}。“自是，深信潜体，毅然以圣贤为己任，常以不及师事文成为恨，且曰‘学无师，终不能有成’，于是受学于文成之门人刘晴川，尊信师门良知之说”^{[5]32}，成为将阳明学传入洛阳的第一人。其弟子孟化鲤，字叔龙，号云浦，河南新安人，曾师从西川，与山东王学学者孟秋（字我疆）相从甚密，时人称“二孟”。孟化鲤“生平服膺曹端”^{[5]39}，为光大洛阳王学之核心人物，其讲学影响远及秦晋，亲建“两贤祠”，祀曹端、尤西川^[16]。吕维祺称其“伊洛为洙泗嫡派，而先生崛起，上接月川之钵，近振西川之铎，程邵以后，一人而已”^{[17]180}。点明了其思想渊源和对洛学之自觉承继，视之为二程、邵雍之后洛学成就最大者。万历年间，尤西川弟子董尧封的儿子董定策时任御史，上疏荐曹端、尤时熙与孟化鲤三人从祀孔庙称：“古人以学为实，今人以讲学为名，若臣乡曹端、尤时熙、孟化鲤三贤皆以孝弟忠信为践履，以杜门却扫为修，出为真经济，处为真学问。”^{[8]1552}明末洛阳王学学者吕维祺居乡期间，“虑伊洛久湮，圣学不明”^{[18]467}，与朋友弟子结社讲习，建芝泉书院，祭程颢、程颐、邵雍、司马光、曹端、尤时熙、孟化鲤等伊洛7位乡贤，号召“吾曹立志要学孔子，要从诸先生做起”^{[17]134}，自觉弘扬洛学，对乡贤的认同赞誉昭昭可见。

由上对明代洛阳王学的师承谱系的简述不难看出，洛阳王学有清晰的师承关系、传授谱系，呈现了明显的地域特色和自觉承继二程洛学的学风倾向。整体来说，明代中后期中州王学尽管不如南方兴盛，但亦非梨洲所谓的“独少”。

王学在中州传布的同时，朱子学在中州长期浸染，绵延发展不绝，代有新人，几与王学颉颃，甚至站在了这一时期全国朱子学发展的高峰。据《中州人物考》理学编和《洛学编》，这一时期的中州朱学代表人物主要为王廷相、吕坤、王尚絅等。在阳明心学风靡天下之际，王廷相、王尚絅坚守朱学立场。对于王廷相，有学者认为他哲学中“较多地包含着实证科学

的因素，他的思想为中国文化的转型提供了一种可能”^{[19]375}，“较多地包含着新思想的因素”，甚至“王夫之在某些方面不及王廷相”^{[19]365}。吕坤论学，反对王学，崇尚礼法，梁启超曾称其学为“新洛学”：“新吾（吕坤号）之学，持养绵密，而专向平实处致功。善察物情，而勇于任事，妙于因应。与当时王学末流之好高谈大言者异撰，然亦受时代影响，持论不如二程之迂。新吾之洛学，盖新洛学也。”^[20]

明中晚期中州王学与朱学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洛学的内容。孙奇逢概括道：“中州有两路学脉：月川（曹端）尺尺寸寸不失朱紫阳，西川（尤时熙）字字句句不失王阳明。是皆深造而有得者，非剽窃也。”^{[21]1122}中州作为二程洛学的发源地，尤其在明代，朱学和王学两脉可以说是齐头并进的。孙奇逢对于明代中州学术发展的概括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入清以后，中州洛学继续发展，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一代大儒孙奇逢讲学传道，睢州汤斌、登封耿介、上蔡张沐等前往从游，一时中州讲学之风大兴。梁启超曾谓：“清初洛学之昌，实自夏峰。”^[20]孙奇逢弟子众多，著名者有汤斌、窦克勤等。孙奇逢亲自编录《中州人物考》，收录有明一代中州名贤“以备中原之人物”^{[5]11}，其中理学28人。又命弟子汤斌编纂《洛学编》。另一弟子耿介则有《中州道学编》，历数洛学传承脉络，由二程至元许衡明薛瑄曹端以至于今，“三百年来，在朝在野，亲炙私淑，代有传人”，“伊洛一脉其圣道之大宗”^{[9]9}。

清初中州士人展开了整理搜集编纂中州理学资料的工作，从中透露出复兴洛学、传统道统的自觉和努力。李来章在《中州道学编》序中表彰二程创立洛学，“其后又于元得许文正崛起于怀孟，于明得薛文清奋迹于鄢陵，自曹靖修、孟云浦而下，代有其人世守洛学绵绵不绝”^{[9]1-2}。窦克勤有类似看法：“豫土居天地之中，为阴阳交会之所，蕴气中和，藏脉深厚……就中州而论，河洛一区实为道统托始之地。”^{[9]3}时人以复兴洛学相期盼，张沐和李来章在《南阳书院学规》以“吾辈居近伊洛，当使二程之学大振于今日”相号召。正如邓洪波指出的，“描述洛学与程朱理学之间的关系，强调洛学承上启下的作用，有意突出洛学的地位，显现出一种很强烈的乡邦情结。”^{[22]111}田

兰芳(商丘睢州人)曾这样描述明末清初中州洛学发展传承情况:“皇朝云雷之初,孙钟元自燕来,徙讲席于邵、姚之故址,一时负笈来学者甚众。两河文教聿兴,如吾里汤潜庵司空、吾师徐我庵处士、上蔡张仲诚、登封耿介石无不实其归而树之风,自是程氏所传之道复大明于中天。”^[23]清初王晋徵对清初洛学之兴盛记载:“中州六七十年间,征君倡道于夏峰,潜庵(汤斌)嗣音于睢水,而登封逸庵耿先生(耿介)又同时后先颀颀于潜庵者也。厥后柘城窦敏修(窦克勤)氏,中牟冉永光(冉觐祖)氏又皆砥砺躬修,精心著述,其所造已足为天下后世所信从。呜呼!沐朝廷振兴鼓励之盛心,承宋之明历代相传之统绪,中州乃能儒硕迭起,文献相望,为四方有志者所矜式耳弗替,何其盛也!何其盛也!”^[24]洛学一时呈现积极发展态势。清中期陈宏谋任职河南时曾以清初的孙奇逢、耿介、汤斌、张沐、冉觐祖、张伯行、窦克勤、李来章为中州八先生。八人之间或师或友,同气相连,撑起了洛学最后的兴盛。清初中州理学学者表现出了强烈的传承二程之学,赓续洛学血脉,复兴二程洛学、表彰中州名儒的自觉性。

清中期以后,中州洛学代表性的人物主要有倭仁和李棠阶。徐世昌曾说:“中州河岳广峻,民物敦固。自周程讲学以‘主敬存诚’为修道进德之本,启诱来者,越六百年,复得夏峰孙民纘其余绪,导扬礼义,以振衰而式靡焉。中州理学之传,遂又阅二百年而弗坠。其居最后以儒修得大名者,则倭文端、李文清二公。”^[25]倭仁,蒙古族正红旗人,出生成长于河南开封。与倭仁同一时期的李棠阶在其编订的《志节编》下卷中“止举中州,以居既相近,感动尤易也”^①,重视弘扬中州先贤精神事迹。其思想倾向中州著名士绅张镇芳视之为王学一脉:“咸同之际,讲王学者有河内李文园先生。”^{[25]3}随着清末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从制度到思想上向西方学习,学术开始向近代转型,流传千余年的洛学也走向终结。

由上述洛学发展谱系看,自二程创立以来,洛学从宋到清,发展虽有起落,然延续不绝,其历程大概可以分为创立发展、维系延续、兴盛、衰歇四个阶

段。第一阶段为创立发展期。二程长期讲学,门人弟子众多,同时又与劭雍、司马光等中州名贤互相切磋,共同构成了洛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据《洛学编》所记,北宋一朝,洛学共有传人14人,分别为二程、劭雍、吕希哲、吕本中、尹焞、谢良佐、张绎、刘绚、李吁、孟厚、朱光庭、邵伯温、程迥。第二阶段为传承延续期。从北宋灭亡到明代中后期中州王学兴起前。北宋灭亡以后洛学在北方发展衰绝,一直到元代“许文正公鲁斋先生身任斯道,接濂洛关闽之传”^{[11]648},洛学在中州发展才得以接续。明初学术延续程朱余绪,中州之曹端、薛瑄是这一时期全国学术之代表。清初洛学学者曾叙述洛学在二程之后的传承谱系,“其(二程)后又于元得许文正崛起于怀孟,于明得薛文清奋迹于鄢陵,自曹靖修孟云浦而下,代有其人世守洛学绵绵不绝”^{[9]1}。“在元则许文正接道学之统,在明则曹靖修开道学之先,而薛文清托籍于鄢并称中州大儒。”^{[9]5}从元到明中期洛学继续延续发展,一度成为全国学术之代表,但基本上是程朱理学的延续。第三阶段为兴盛期。自中州王学兴起到清前期。明代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空间的松动、经济的发展,阳明心学一扫官方程朱理学的沉闷僵化、繁琐支离,在东南兴起,并迅速发展,传播到中州,促进了以洛阳为中心中州王学的兴盛,一直延续到明亡。同时以睢阳为中心,以锦襄书院、朱阳书院、清见书院和洛学书院等为阵地,中州东部商丘一带出现了王廷相、吕坤、鲁邦彦等有名的朱子学者,中州王学与朱学并兴,洛学一时蔚为大观。入清以后,河北人孙奇逢定居夏峰,讲学百泉,进一步延续了洛学活跃的姿态。孙奇逢弟子众多,“上自公卿大臣,以及儒生隐士,近自畿辅、河洛以及齐、普、晋、楚、吴越之间,有志于斯道者,无不负岷从游”^{[26]260},“北方学者奉为泰山北辰”^{[27]1}。入清以来,中州洛学活跃态势不减,有所谓的中州八先生之说。整个来看,从明中后叶到清初,这一时期中州洛学人物众多,多有创获发明,在全国学术版图占据重要地位,显示了洛学强大的生命力和蓬勃发展的态势。第四阶段进入衰歇期。清中后期国运衰败,思想沉闷,加以中州经济文

① [清]李棠阶:《李文清公遗书(卷8)》,光绪八年河北道署刻本。

化发展落后,洛学发展也逐渐停滞,走向了衰绝。不过中州地处内陆,较少受到兴盛于东南的干嘉汉学的冲击,洛学依然占据着中州学术的主流,但已与时代大势相背而驰了,如这一时期中州代表的理学家倭仁就在洋务运动中扮演了保守的角色,反对学习西学,大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28]的高调,喻示着洛学走向绝路。

三、洛学的精神特质

一地域之学术必定呈现出一地域之特色,《世说新语》有南人之学清通简要与北人之学渊综广博的区分。中州“处天地中,理数气运为四方之枢纽,其道亦由斯也,风雨交会,阴阳洽合寒暑均平,节候调适”^{[9]2}。又为理学的重要起源地,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环境和文化底蕴涵养孕育了洛学独具一格的精神特质。

(一)兼容并包

洛学作为地域性的理学学派,其内部思想丰富多元,呈现出兼容并包的特质。以洛学重要人物孙奇逢为例,他学宗陆王,兼采程朱,自述为学经历:“某幼而读书,谨守程朱之训,然于陆王亦甚喜之。”^{[5]721}在最具代表性的著述《理学宗传》中,孙奇逢确立了兼采朱陆的收录原则:“仆所辑《宗传》谓专尊朱而不敢遗陆王,谓专尊陆王而不敢遗紫阳。盖陆王乃紫阳之益友忠臣,有相成而无相悖。”^{[5]727}他不拘门户,认为朱王相成不悖。在儒学发展中,对于宋人轻忽的汉儒,孙奇逢也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圣人之全体大用,及门诸贤有具体而微者,有各具一本者,宋儒不过各分一节目”^{[29]251}。比如对董仲舒,朱熹认为他“不见圣人大道”^{[30]3227},孙奇逢则给予高度评价,许之为“醇儒”^{[21]907}。对于学术之差异,孙奇逢的兼容不仅是简单的调和折中,而是基于对学术本质的理解:“道原于天,故圣学本天。本天者,愈异而愈同,不本天者,愈同而愈异。”^{[5]618}所谓之异,只是在一本之下的分殊,而不是绝然有别:“同而异者,一本散为万殊也。异而同者,万殊原于一本也。”^{[5]670}对于争论不休的朱

陆之学,孙奇逢认为皆属圣学,相资为用:“此两路人,皆不远于圣学之门,正可相资为用,岂可相抵成仇?天下事,惟邪正两家调停不得。既是一家,何不可相忘而共偕大道?”^{[5]408}因而他在《理学宗传》中不拘门户,兼收朱陆,期望后世中州学者,不必严分朱王,惟以进善为归:“中州之学,传紫阳者有人,传文成者有人,两路俱足以证圣。后有兴者,不必分左右祖,而一意进修则善矣。”^{[5]614}清中期著名中州理学名臣李棠阶治学《清儒学案》评价道:“先生之学,以治心克己为本,居敬穷理,一守程、朱之法。教人力求实践,兼取陆、王,不分门户,而志行敦笃。”^{[27]2862}不拘门户,兼收并蓄,成为中州洛学的一个重要精神特质。

(二)笃实重行

洛学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始终如一体现出重践履的学术风格。程颐就认为“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突出笃行的重要性。自元明以来,中州洛学一脉虽然在全国的学术版图中理论创获不及南方,但躬行之笃实则不让焉。元代洛学代表人物许衡曾强调为学之道先务躬行,非止诵书作文而已。后人亦以躬行来概括许衡为学特质:“学以躬行为急,而不徒事乎语言文字之间,道以致用为先,而不徒极乎性命之奥。”^{[11]525}有“有明儒学之冠”之称的曹端,《明儒学案》称其学术“以力行为主,守之甚确,一事不容假借,然非徒事于外者”^{[15]1061}。《明史·儒林传》同样称其(曹端)“学务躬行实践”^{[12]7238}。孙奇逢《中州人物考》亦言曹端“造诣笃实,教人务躬行实践”^{[5]116}。明初洛学另一代表薛瑄同样如此:“为学专务体验躬行,不务论说,尝曰:‘圣贤千言万语,皆说人身心上事,惓惓以复性为教,居敬为功’。”^{[8]1553}

不仅中州朱子学者重视躬行,王学传至中州,亦表现出明显的笃行风格。洛阳王学的孟化鲤在乡创立讲会,联络师友,订立会约,期望通过讲会达到“反观不善果尽改乎?闻义果即徙乎?德果修乎?如是而讲,方谓之真讲;如是而会,方谓之真会”^①。洛中王学张新民言及学与行的关系时说:“讲学贵在躬行,不然学人口语,拾人余唾,有何益处?”^②洛中王学

① [明]孟化鲤:《孟云浦集(卷4)》,万历二十五年张维新刻本。

② [明]张信民:《张抱初先生印正稿(卷3)》,雍正四年王箴舆刻本。

最后一人吕维祺批判说而不行：“若只是此等说，不肯此等行；或未会是此等行，既会犹是此等行；或人前是此等行，独知处又不是此等行，均之无益于学，又无益于会。”^{[17]135}认为不行之学实为无益。他自称：“一生精神结聚在《孝经》，二十年潜玩躬行，未尝少怠。”^{[5]43}笃行之重可见一斑。中州王学如此，朱子学亦然。明后期朱子学者吕坤，四库提要称其所作《呻吟语》“不侈语精微而笃实以为本，不虚谈高远而践履以为程”^{[14]77}。

清初洛学泰斗孙奇逢更是以自己的一生践行圣学之道，尝言“七十岁工夫较六十而密，八十岁工夫较七十而密，九十岁工夫较八十而密。学无止境，此念无感懈怠，此心庶几少明”^{[5]1329}。其所作《日谱》详细记录了六十岁至去世的言思举动，几十年不辍。孙奇逢治学以践履为归，一如嵇文甫所言，夏峰晚年学风“和会朱陆，兼宗汉唐，打破门户之见，而一以躬行实践为归”^{[31]12}。弟子汤斌也同样重视践行：“学者读书，不务身体力行，专为先儒辨同异，亦是玩物丧志。先儒之言，都是自己用工夫体认过来，无一不是实话。”^{[26]3}“学当躬行实践，不在乎讲。讲则必有异同，有异同便是门户争端。”^{[26]21}强调躬行优先于知识的辨析，而所谓认识也不过是从工夫实践中所得，这虽然有忽视知识独立性的倾向，但无疑体现了浓厚的重践履的学术风格。

（三）崇尚致用

二程创立洛学，始终将致用作为为学讲道、读书穷理的目的，反对沉溺于章句无用之学中，其言：“穷经，将以致用也。”^{[32]71}“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今或滞心于章句之末，则无所用也。此学者之大患。”^{[32]1187}洛学自创始深深打上了致用的烙印。许衡处则“以明道为己任”，出则用夏变夷，为元世祖“言治乱休戚，必以义为本”^{[8]1528}，所学皆以经世安民为鹄的。洛阳王学孟化鲤创立讲会，所讲内容“自冠婚丧祭，以及家庭日用、服食好尚之类，大要以厚风俗、崇礼让、返朴还淳为主”^①，皆摒弃玄虚，关乎日用常行。王以悟以经世为圣学区别于异端的标志：“圣学

经世，异学遗世。圣人忧世，异端玩世。忧世者，万物一体，痛痒心切；玩世者，轻世肆志，其流至于麻木不仁。毫厘之差，千里之谬，此学脉所关也。”^②曾任南京兵部尚书的明末洛阳王学人物吕维祺居家则讲学不辍，在任则多有政绩。他明确指出经世致用为为学之本：“学以经世为大，兵农礼乐总是心，精理以适用为真齐治。”^{[17]372}“学问不足经世，又何学之为？以此思之，学力事业非两事也。”^{[17]222}吕坤论学为政强调实用，“天下万事万物，皆要求个实用。实用者，与吾身心关损益者也。凡一切不急之物，供耳目之玩好，皆非实用也。”^[33]他反对空讲心性，留心“经济学术、治平手段”，以为儒者应“非常道不由，非日用不谈，非实物不求，非切民生国计不讲”。他反对“空谈”，嘲笑那些面对现实问题束手无策的腐儒“口坠天花，而试之小小设施，辄不济”，“学不适用”^[34]。论学为政，反对空谈，强调致用，成为洛学又一显著精神特质。

四、总结

洛学自二程兄弟创立以来，与全国各地域性学术思想交相辉映，交流融合，演变成为宋以后中国学术之主脉，影响深远。作为二程之学的直接继承者，中州洛学以浓厚的乡邦情谊和对二程之学自觉认同，历宋元明清代有传人，绵延千余年，成为中州大地思想学术之主流和瑰宝，与全国其它地域之学一道，共同呈现了中华学术的一体多元和丰富多彩。作为地域性的理学流派，洛学植根于中州大地，其人物之多，思想创获之大，在全国地域之学中占据重要位置。中州大地滋养了洛学，洛学也深深塑造了中州一地的精神特质和习俗风貌。当下，相比各地域之学研究走向系统和深入，洛学研究显得单薄而零散，深入整理洛学乡邦前贤文献，开展洛学的系统研究，繁荣中原文化发展，迫在眉睫，义不容辞。

参考文献：

[1] 卢钺.王著作文集序[M]//全宋文第351册第8124

① [明]王以悟：《理学云浦孟先生年谱》，康熙十二年刻本。

② [明]王以悟：《王惺所先生集：卷9》，天启刻本。

- 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260.
- [2]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3]宋濂.宋濂全集:第2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2014:926.
- [4]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3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 [5]孙奇逢.孙奇逢集:中册[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 [6]吕焯.尹健余先生年谱[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21.
- [7]丛书人物传记资料类编:学林卷:第9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6.
- [8]汤斌.汤斌集:下册[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 [9]耿介.中州道学编[M]//四库全书丛目存书史部12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
- [10]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4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 [11]许衡.许衡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9.
- [12]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3]曹端.曹端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14]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子部:儒家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1.
- [15]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16]邱菽,吕宣曾.新安县志:卷8[M]//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南府县志辑:第70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132.
- [17]吕维祺.明德先生文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 [18]施化远,等.明德先生年谱卷4[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 [19]李存山.汉代与宋明儒学新论[M].北京:京华出版社,2020.
- [20]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24(1):2—37.
- [21]孙奇逢.孙奇逢集:上册[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 [22]邓洪波,王胜军.河南书院与清初洛学复兴[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110—114.
- [23]田兰芳.朱阳书院志序[M]//中国历代书院志:第6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448.
- [24]王晋徵.敬恕堂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2.
- [25]李棠阶.李文清公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2010:1.
- [26]汤斌.汤斌集:上册[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 [27]徐世昌.清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28]筹办夷务始末:第5册:同治朝卷47[M].中华书局,2008:2009.
- [29]孙奇逢.孙奇逢集:下册[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 [30]黎靖德.朱子语类:第8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1]嵇文甫.颜习斋与孙夏峰学派[J].郑州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2(1):12—19.
- [32]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33]吕坤.呻吟语[M].长沙:岳麓书社,2016:225.
- [34]北方王门集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802.

作者简介:张辉,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儒家哲学研究。

(摘自《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1期)